

全球智库半月谈

新“长期停滞假说”的思考

演进中的制度前景

溢出效应持续发酵，新兴市场国家何去何从？

贸易自由化带来双赢

解读一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

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本期编译

郭 楚

郭子睿

李 骁

刘 洁

刘天培

刘兴坤

马文龙

沈仲凯

苏 丹

唐靖茹

许平祥

杨国梁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新“长期停滞假说”的思考 4

导读：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正遭受长期停滞的困扰，这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详细解释了长期停滞的观点，认为低通胀条件下充分就业所需实际利率(FERIR)的下降，可能会无限期地阻止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

日本央行留给欧元区的教训 9

导读：本文认为欧元区可以从日本近期的货币政策中吸取三大教训。第一，改变民众对通缩的预期非常困难。第二，欧元区不应该低估财税政策的作用，过于严格的财政紧缩力度可能会拖累经济复苏。第三，欧元区必须考虑可能面临的压力。

谁害怕轻微的通货紧缩？ 10

导读：随着欧盟通货膨胀降至 0.3% 以及美国通胀增长的放缓，通货紧缩像幽灵一样困扰着西方世界。本文首先列举了人们恐惧通货紧缩的四条理由：粘性工资、货币政策空间、债务支付和通货紧缩螺旋。随后作者一一进行了反驳：第一，对于 20% 的急剧通货紧缩，粘性工资会加大企业的成本，而对于目前稳定的 2% 的通货紧缩，粘性工资并不是问题；第二，即便利率下降到零，央行可以采取类似于量化宽松的政策来刺激经济；第三，目前稳定的 2% 的通货紧缩并不会大大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更不会引发债务危机；第四，经济本身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可以抑制通货紧缩螺旋的形成。

全球治理

演进中的制度前景 13

导读：本文通过分析从 1940 年代以来建立的全球公信体系，揭示了全球共同治理的变革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 WTO、IMF 和 G20 等。新的公信体系为弥补旧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发银行之间的斗争 15

导读：布里斯班 G20 峰会取得的重要进展是，有必要创建并维系能够承担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的开发性银行，这是达成 2% 的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条件。基础设施开发融资方面的竞争引发货币战争的同时也引发了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政治斗争。布里斯班峰会确立了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优于其他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的霸权地位，从而重申了 G20 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予以支持。

溢出效应持续发酵，新兴市场国家何去何从？ 17

导读：发达国家在大衰退时期实施了不少财政或货币政策，然而其溢出效应却不断遭到新兴市场国家的抱怨。尽管美联储重新走入正轨，然而日本央行及欧央行依然在实施宽松政策。在其溢出效应下，新兴市场国家将何去何从？是否有办法限制过度的经济波动？

经济政策

零利率下限约束有多严重? 20

导读: 2008年12月, 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近零, 并保持至今。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思维相反, 直到2011年中期, 货币政策并没有严重受此束缚。这意味着, 美联储2009-2011年间的货币政策可以更宽松。本文的上述发现有助于解释2009年的财政刺激方案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贸易自由化带来双赢 22

导读: 近期, 国际贸易市场展现出较好的态势。信息技术协议(ITA)、贸易促进协议(TFA)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都在稳步推进。如果这三个协议顺利达成, 将会极大地刺激全球GDP的增长。本文对前两个协议签订过程进行分析和展望。

聚焦中国

解读一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 24

导读: 今年, 中国中央领导集体试图通过全面经济改革实现经济发展再平衡, 这一宏伟计划涉及范围甚广, 力度甚大, 成为国内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作者认为, 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改革计划不同, 本次改革是一次“潜在的革命”, 它注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全新的协调机制的“顶层设计”, 宏观政策实验更趋审慎, 更多地考虑应对国际压力。同时, 此次改革也蕴藏着潜在风险: 第一, 有限的试点无法预期整体政策效果, 反而加剧改革政治学的复杂性; 第二, 渐进性改革方式已不适合当前极为复杂的经济形势。

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 而非衰退 27

导读: 房地产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性在中国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近期的种种数据引发人们对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衰退的担忧。本文认为短期来看, 房地产行业确实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但从中长期来看, 房地产需求依旧旺盛, 同时中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基于中长期结构性因素, 本文认为此番房地产业下行主要是对之前产能过剩的调整, 而非衰退。

战略观察

20国集团与全球治理: 可以做的更好吗? 29

导读: 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本周末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有一些人开始质疑G20是否还有实用性。这个排他性的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组成的集团能否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希望?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埃博拉的爆发对公共卫生与安全的启示 32

导读: 2014年9月30日, 西非以外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在德克萨斯的达拉斯被确诊。当该病的其他几个疑似病例——包括在瑞典的一例——被证实并非埃博拉, 德克萨斯的病例可能成为合理动员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一个起点。然而, 它也有可能证明, 任何类似的动员都来得有点太迟了。决策者的关键任务, 将是在国际安全议程中为全球卫生事业更大范围的议题提供一个永久的地位。本文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彼得·克莱乌斯蒂格撰

写。

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34

导读: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其在东亚、亚太的影响力不断持续提高。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战略存在也将长期维持。未来推进亚太经贸合作的不同路径仍具有竞争性和不确定性。在一个崛起的中国和一个守成的美国的夹缝中，东盟将何去何从？

本期智库介绍 37

新“长期停滞假说”的思考

Lawrence H. Summers /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正遭受长期停滞的困扰，这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详细解释了长期停滞的观点，认为低通胀条件下充分就业所需实际利率（FERIR）的下降，可能会无限期地阻止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编译如下：

在工业化经济国家中，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目标，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长期停滞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FERIR）会下降，简而言之，低通胀条件下的 FERIR 下降可能无限期地阻止充分就业。即使我们可以达到充分就业所需的实际利率，但这很大程度是以大量金融不稳定为代价。本文首先从 FERIR 下降的角度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然后列举各种影响因素，来说明过去几十年中，为什么工业化国家的 FERIR 呈现大幅下降；最后，讨论了长期停滞和滞后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视角的政策意义。

七年前，宏观经济学领域似乎一切都很完美。“大缓和”的术语变成战后实际商业周期波动的首要部分。方法论上广泛共识支持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理解宏观经济波动和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估。独立中央银行的关注点应该是保持适当的通胀目标而努力熨平经济波动，这一论点也得到普遍的支持。经济危机导致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危机。图 1 a 和 1 b 描述美国和欧元区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缺口的估计。很明显，2008 年的产出远低于其预计的潜在产出水平。更令人不安的是，大多数的缺口将代表一个永久性损失，使得潜在产出需要大幅向下修正。如欧元区，低于 2008 年预计潜在 GDP 近 15%，使得潜在产出下调近 10%。

图 1a. 美国的实际和潜在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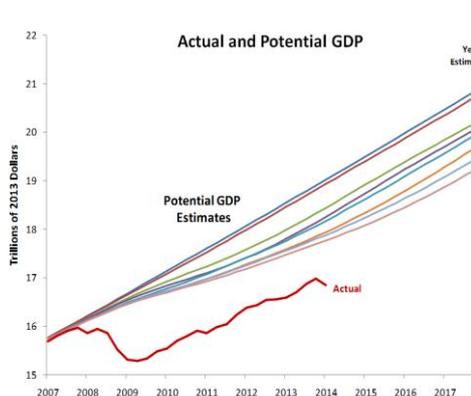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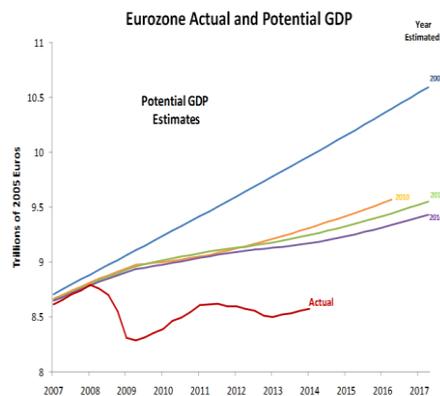


图 1b. 欧元区的实际和潜在 GDP



日本 1990 年代以及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经历表明，为了理解和应对经济波动，采用产出和就业平均数据序列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无效的。不幸的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传统都集中关注产出和就业的二阶矩(方差)。他们认为，无论政府是否干预，市场机制会自动最终恢复充分就业和消除产出缺口。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回到正常区域。新“长期停滞假说”阐释了最近的经验事实和传统理论的明显不足，并认为仅通过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是不可能实现令人满意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它为世界工业经济复苏蹒跚以及日益突出金融稳定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1、长期停滞假说和最近的经验事实

美国经济距 2009 年第 2 季度的谷底，现在已过去超 5 年有余；需要政府救助或提升银行债务风险溢价已深入人心。然而，美国经济在过去的 5 年中，平均增长率仅为 2%。在欧洲，信贷息差下降和欧元区解体的担忧一直持续；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缓慢，预计未来增长前期仍然黯淡。

• 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

在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稳定增长似乎掩盖了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在 2003-2007 年期间，经济增长是如此惊人。当然，此阶段也是信贷标准的侵蚀、房地产泡沫的积累、预算赤字和金融监管放松的时期。然而，假如信贷标准得以维护，房地产也无泡沫，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那么，很有可能产出增长将明显不足，因为需求不足。2003 年之前美国经济处于 2001 年衰退的阵痛之中，更早之前则是由互联网和 1990 年代的股市泡沫所引发的衰退阶段。所以，2003-2007 年已经接近 20 年来美国经济相对健康可持续增长时期。对欧洲来说，由于涉及到结构性的评估问题，判断起来比较困难。但是，有充足证据表明，欧洲 2010 年之前的强劲增长主要依赖于廉价的信贷资金；而北欧则源于不可持续的出口驱动。

• 不可持续的融资

假设发生了实质性的冲击，这往往会增加私人储蓄倾向，并减少投资偏好。这如何会影响经济增长呢？对该问题的正常回答是，人们会预计利率持续下降，直到充分就业的利率刚好能使得储蓄和投资相等。也就是说，由于储蓄和投资倾向的变化，政府赤字可能会影响经济中的 FERIR 而不是产出和就业。但该逻辑推理中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利率必须具有完全灵活性。事实上，在现代经济中，短期内的安全利率不可能降至零以下，因为货币具有替代的可能性。所以，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利率并不是完全灵活的。

因此，可能无法得到使得投资和储蓄相等的充分就业利率。这就是长期停滞假说的情形，此观点最早由阿尔文 汉森（Alvin Hansen）在 1930 年代提出。

正如，凯恩斯、托宾和布拉德 德隆以及本人所强调，工资和物价的灵活性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工资和物价越灵活，实际利率上升所导致的产出下降就越严重。事实上，通缩有可能又导致实际利率进一步上升，使得产出下降更快，价格下跌更加迅速，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 **低利率和金融不稳定**

在理论上，有可能存在这么一个正的利率，它可以满足充分就业的目标，但与金融稳定是相冲突的。低水平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以各种方式影响金融稳定；因为他们增加了投资者风险偏好，促使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他们也会使得庞氏金融结构看起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利率相对预期增长率来说变得非常低。因此，通过努力把利率降至某一个点，使得经济表现相对让人满意，但必然引发金融稳定性问题。2003-2007 年期间的经济状态，就是这种情况。

2、FERIR 发生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如果 FERIR 大幅下降，必然会导致一个令人不满的经济增长和不稳定的金融体系，正如我们近期所观察到的那样。然而，我们认为主要工业化国家的 FERIR 已经下降的假设是否合理？萨默斯(2014)总结了多种结构因素的变化，表明 FERIR 水平确实已经大幅下降。包括：

- 缓慢的人口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速度下降意味着对新资本品需求的减少。
- 更低价格的资本品意味着在给定的储蓄水平可以购买到更多的资本。
- 贫富不均的加剧意味着那些消费倾向较低的群体获得更多的收入。
- 金融中介摩擦的增加，市场参与者越来越趋于风险规避。
- 人们强烈呼吁央行和政府积累储备，采用谨慎的投资策略，以降低安全利率。
- 持续的通缩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实际利率和实际税后利率都是过高的。
- **来自 FERIR 估计的证据**

图 2 显示了世界各国指数化的平均实际利率；很明显，FERIR 已经在过去的 15 年呈下降趋势。图 3 展示了对于美国自然利率变化趋势的估计，FERIR 同样呈现长期下降。

图 2.世界平均的实际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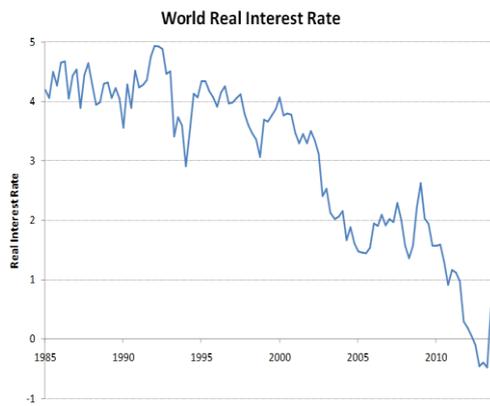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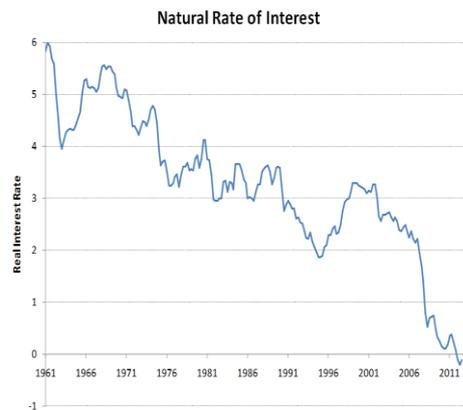


图 3.美国的自然利率



本文的结论——FERIR 已经在最近些年呈现持续下降，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关于工业国家的实际利率变化趋势的判断是相一致的。美国和欧洲的 FERIR 和通货膨胀持续下降，使得降低实际利率比以前变得更加困难。反过来，这意味着零利率下限和长期停滞，可能在未来将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分析表明，未来几年如果要维持充分就业，工业化国家需要一个低于历史水平的实际利率；然而，这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3、结论和影响

如果新“长期停滞假说”有效，将会令人担忧。这表明目前的货币政策可能难以使得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和潜在产出水平；如果我们可以以金融稳定为代价，以达到这些目标，那么我们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 长期停滞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阿尔文·汉森在 1930 年代末提出长期停滞的风险，是基于二战期间及其战后经济繁荣的背景。当然，有可能外生事件的发生，可以增加支出或降低储蓄的方式提高工业化国家的 FERIR。然而，短期来看，这类事件很明显是不可能发生，我们也不知道此类事件是什么。此外，足够的证据支持 FERIR 的下降可能会持续至下一个十年。即使在增长已经出现加速迹象的美国，我们没能找到潜在产出正在上升的证据。

- 有可能是滞后倾向问题吗？

长期停滞的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工业化世界潜在产出呈现普遍下降的特征。虽然现有的证据支持全球大范围潜在产出的下降，实际产出也出现同步下降。该观点给出了经济体在实际利率高于 FERIR 时趋于均衡的可能方式。滞后倾向理论强调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在于随后的产出预测，因为当缺乏物质资本、工作投入激励和新产品创新的时候，潜在供应可能最终下降至需求水平。

也许萨伊定律更合理的推论是——“需求的缺乏导致供应的不足”。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供给潜力的下降，FERIR 上升至均衡水平；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 **全球视角的考察**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解释长期停滞的观点显得尤为重要。分析的最好方法是把世界工业经济进行加总，因为资本的流动性，实际利率往往会收敛。如果工业化经济体的 FERIR 足够低，人们可能预期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使得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汇率下降，竞争力和出口需求的增加。困难的是，这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被新兴市场对接受。因为，他们的反应很可能是抵抗资本流入或努力管理货币价值来保持竞争力。无论是哪种情况，结果都将进一步使得工业化国家的利率承受下行的压力。

4、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长期停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策略以解决其有害影响。

首先是设法进一步降低实际利率。这些可能包括形成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目标，这样一个零名义利率将对应于一个较低的实际利率。或者它也可能包括寻找量化宽松工具来减少信用风险溢价。当然，这些策略有困难；即使他们增加了产出，也可能会增加金融稳定风险，进而可能反过来影响产出。

另一种选择是通过增加投资和减少储蓄来增加需求。提高 FERIR 的同时，促进金融稳定以及增加产出和就业。这怎样才能完成？适当的策略将会因国家和情境而异。但他们应该包括增加公共投资，减少结构性障碍以促进私人投资和促进商业信心，承诺保证基本的社会保障，维护消费能力和向那些有较高消费倾向的群体重新分配收入以降低不平等。

本文原题为“Reflections on the new 'Secular Stagnation hypothesis'”。本文作者 Lawrence H. Summers 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和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现为哈佛大学校长级讲座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 30 号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日本央行留给欧元区的教训

Guntram B. Wolff / 文 苏丹 / 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欧元区可以从日本近期的货币政策中吸取三大教训。第一，改变民众对通缩的预期非常困难。第二，欧元区不应该低估财税政策的作用，过于严格的财政紧缩力度可能会拖累经济复苏。第三，欧元区必须考虑可能面临的压力。编译如下：

日本央行于今年 10 月底再度推出货币刺激政策，决定扩大货币宽松规模，以刺激因上调消费税而遭受打击的实体经济。这一突然宣布的决定使得日元大跌，股市大涨。事实上这一决定也表明日本央行提升通货膨胀预期的决心，并最终希望达到 2% 的目标。早前日本上调消费税税率的举措，曾引发通货膨胀将受到过度抑制的担忧，而刚刚发布的日本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似乎验证了这一忧虑，所以日本央行大胆作出扩大资产购买计划的决定，力图减少人们对经济通缩的预期。

为避免出现类似大起大落的政策调整，欧元区和欧洲央行可以从日本近期出台的货币政策中吸取哪些教训呢？本文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欧元区和欧洲央行必须认识到要改变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预期非常困难，这对欧洲央行来说是重要的一课。事实上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已经出现了显著下降：五年期预期通胀率仅为 1%，显著低于欧洲央行 2% 的官方目标。这要求欧洲央行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以避免市场对其失去信心。为了避免被迫采取过于庞大的货币宽松政策，欧洲央行必须采取更大胆的政策措施，以确保通胀预期尽快回到目标水平。

第二，欧元区不应该低估财政政策的作用。在日本，增加税收是提高财税政策可信度的必要条件。然而在目前的环境下，上调消费税计划的时机尚不成熟，会显著削弱经济动力。当然，消费税是否是当前最优的征税方式则另当别论。对于欧元区大部分国家来说，到 2013 年为止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事实上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并促成了通货紧缩的趋势。目前来看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降低了财政紧缩力度。新一届欧盟委员会需要成功实施一项由共同财政资源资助的包含整个欧洲的投资刺激计划，这将有助于欧洲经济恢复增长。

第三，日本央行理事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这一大胆决定，而在欧元区，仅占微弱多数将很难使过于激进的决定获得通过。一项引起过多争议的政策，虽然并不一定导致欧洲央行丧失行动力，但必将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压力。一旦陷入通货紧缩，欧元区需要克服比日本更多的困难。

本文原题为“Lessons from the Bank of Japan for the euro area”。本文作者 Guntram B. Wolff 为比利时 Bruegel 研究所所长。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谁害怕轻微的通货紧缩？

John H.Cochrane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随着欧盟通货膨胀降至 0.3% 以及美国通胀增长的放缓，通货紧缩像幽灵一样困扰着西方世界。本文首先列举了人们恐惧通货紧缩的四条理由：粘性工资、货币政策空间、债务支付和通货紧缩螺旋。随后作者一一进行了反驳：第一，对于 20% 的急剧通货紧缩，粘性工资会加大企业的成本，而对于目前稳定的 2% 的通货紧缩，粘性工资并不是问题；第二，即便利率下降到零，央行可以采取类似于量化宽松的政策来刺激经济；第三，目前稳定的 2% 的通货紧缩并不会大大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更不会引发债务危机；第四，经济本身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可以抑制通货紧缩螺旋的形成。编译如下：

随着欧盟通货膨胀下降到 0.3% 以及美国通胀的放缓，通货紧缩如幽灵般困扰着西方世界。经济学人最近宣布，通货紧缩是一个“致命威胁”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将通货紧缩称为“怪物”，会“给经济复苏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是真的。就像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期间，价格的大幅度骤降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如债务人违约、工资调整滞后。但这次紧缩源于中央银行没有调整对资金的突发需求，从而导致了金融恐慌。

现在担忧的是价格的缓慢下滑，每年下降幅度为 1% 至 2%，短期利率长期徘徊在在零利率附近。如果经济增长缓慢，流动性充裕，信贷利差较低，上述场景会有所改善。而且，轻微的通货紧缩也有好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很久以前就认为轻微的通货紧缩可作为最优的货币政策指标，这是因为居民和企业会持有大量现金而不用担心会贬值。那为什么人们还认为通缩是一个大问题呢？

1、粘性工资

通常来说，雇主不愿意削减工资，但通货紧缩会导致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随着产品价格的下降以及工资的上涨，雇主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对于突如其来的 20% 的通货紧缩，粘性工资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稳定的 2% 的通货紧缩，这并不是问题。一个代表性的工人每年的工资平均上涨 3%，其中 2% 源于他工作经验的增加，另外 1% 源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只有通货紧缩超过 3%，工人的工资才有可能被削减。除此之外，每隔四年半，代表性工人就会更换工作。在不断变换的劳动力市场，代表性工人的工资位于易变工资分布曲线的平均值。因此，很少有雇主会通过削减代表性工人的工资来适应 2% 的通货紧缩。

奇怪的是，如果粘性工资是核心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对非粘性工资的呐喊：降低最低工资，更少的工会化，更少的司法干预工资，更少的职业执照等等？

2、货币政策空间

美联储希望实现 2% 的通货膨胀率。这是因为“正常”利率 4%，美联储可以有一些政策空间来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经济。但是，当利率下降到零时，我们可以使用类似于量化宽松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在今天看来，为下一个经济萧条创造政策空间并不是什么问题。

3、债务支付

通货紧缩会使政府的税收收入下降，债务负担加重，负债累累的政府可能会违约，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突如其来的 20% 的通缩是一回事，但缓慢下滑至 2% 的通货紧缩是另一回事。如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 100%，经过一年未预料到 2% 的通货紧缩，债务占 GDP 的比率将上升为 102%。以这个速度下去，估计需要几十年的通货紧缩才会导致债务危机。

奇怪的是，IMF 十月《世界经济展望》所提到的反通货紧缩的核心措施时鼓励政府借钱，通过增加支出刺激经济。IMF 至少会意识到这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但它们宣称政府支出可以极大地刺激经济，有助于增强将来偿还债务的能力。

4、通货紧缩螺旋

自从 20 年前日本的利率下降到零以来，凯恩斯主义一直在警告“通货紧缩螺旋”。逻辑是这样的：在零利率的通货紧缩情况下，人们持有货币或零利率的债券，到下一年购买力就会增加，这会刺激人们延迟消费，降低需求，从而导致产出下降。产出的下降，会加剧通货紧缩，从而形成通货紧缩螺旋。

但是，这次通货紧缩螺旋不会发生。首先，从政府的偿债能力来看，2% 的通货紧缩不足为惧，这会阻碍通货紧缩螺旋的形成。如果物价下降 20% 或者 30%，债券持有者就会认为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他们会出售债券、购买商品或别的货币，以避免政府违约。这会将通货紧缩螺旋扼杀在萌芽之中。

但是，目前的通胀形势令我们不安。显然，缓慢下滑的通胀与中央银行想要的更高通胀的目标并不一致，但是央行对通胀紧缩的控制能力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

根据传统的观点，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央行对通胀的控制就像平衡一把倒立的扫帚，利率在底部，通胀在顶部。央行不得不控制利率来保持通胀或者通货紧缩平衡。如果想要高通胀，必须暂时降低利率，让通货膨胀上升，然

后并迅速稳定。当利率下降到零，美联储不能再移动扫帚，通货膨胀会转而陷入通货紧缩。除了我们到达零利率底线之外，几乎什么也没发生。也许经济本质上并不是那么不稳定，不需要不断的指导。

底线？请放松。每隔几个月，我们都会听到有人呼唤政策制定者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还是等下一个吧。

本文原题为“Who’s Afraid of a Little Deflation?”。本文作者 John H.Cochrane 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刊于华尔街日报。[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演进中的制度前景

Matthew P. Goodman /文 唐靖茹/编译

导读：本文通过分析从 1940 年代以来建立的全​​球公信体系，揭示了全球共同治理的变革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 WTO、IMF 和 G20 等。新的公信体系为弥补旧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编译如下：

70 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44 个联盟国家签订布雷顿森林协定，开始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40 年前，该秩序逐渐崩塌。由此次会议延伸建立的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它们作为经济秩序的制度支撑巩固了世界经济长达 70 年的繁荣。

过去的数十年间，两大问题一直困扰着上述多边体系的公信力。其一，经常性的失职，例如在促进增长和贸易自由化方面。其二，治理结构过时，无法体现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虽然多方力量正尝试修正这些问题，例如 IMF 配额改革以及 WTO 部长级会议，但是大多数努力迄今为止未见成效。

过去数年间，一系列发展使制度问题被逐渐放大，一些国家，包括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厌倦了等待原有制度改良，转而寻求其他变通方法。一些主权国家有意识地支持重构多边秩序，另一些则似乎被狭隘的顾虑所局限。无论如何，这些新制度如果缺少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就很可能摧毁现有秩序。

贸易的变通渠道已经被规范化。经过多哈发展议程十年的无效多边谈判后，2011 年 11 月在戛纳举行的 20 国集团领导人会议（G20）提出朝着新生的，互信的贸易自由化处理方式推进。这刺激了 2013 年 12 月在巴厘岛签订的新多边贸易便利化协定顺利达成。由于印度的阻碍，最终共识未能达成，导致该协定解体。

WTO 中不同集团也在谋求多哈框架外的区域化贸易制度。亚太地区沿两个轨道前进：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在大西洋两岸，美国与欧盟正努力达成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些磋商进展缓慢，而且有理由相信在两三年之内可能会停滞。

不同领域的积极磋商，正达成新的新多边协定成果，包括信息技术协定（ITA-II）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也威胁着原有多边贸易体制。它们如果继续向新成员开放，并且建立在已有规则之上而非损害原有规则，就完全有可能建立另一套通往 21 世纪的贸易规则，从而替代漫长的多哈回合会议。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全球经济新的制衡力量纳入治理结构，也在缓慢推进。在 2010 年的 G20 会议上，美国支持在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重新分配 IMF 的“票子和位子”，但因未获美国国会批准而止步不前。对此，新兴市场已

明显丧失耐心，开始寻求自主解决途径。在 2013 年东南亚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创想，计划在今后十年间每年拿出约一万亿美元，投资建设本地区大型基础设施。2014 年 7 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启动了新发展银行（一般称为“金砖国家银行”）的计划，为这五国甚至其他国家的发展项目筹资。

AIIB 和金砖国家银行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其推动者尤其是中国力图获得更多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这些新制度能否增强规则导向的秩序？是个问题。但令人兴奋的是，北京方面已经开始明确 AIIB 的治理结构和实际操作，包括环境等借贷标准、公开透明、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其他已有多边体制的操作方式保持一致。

最后，作为领导级论坛，G20 在 2008 年实际上取代了早期的 G7 集团。G7 由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组成，最初是为了满足其能源消费而建立的。由于容纳了主要的新兴国家，G20 在早期的数次峰会中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合作，以对抗金融危机。然而，G20 论坛今年遭遇了如下问题：共识逐渐减少；核心议题难有突破，如加快发展、金融稳定以及国际化金融建设改革。作为 2014 年的主办国，澳大利亚力图恢复 G20 的互信关系，希望在“增长与弹性”主题下寻求切实成果，但 2015 年主办国土耳其可能难以维持 G20 作为全球经济领导集团的角色。

撇开效力、合法性和增进变通等议题，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战后规则导向的经济秩序在过去 70 年间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很难会被成就更大的另一套基础体系和规则所取代。

在目前的推进过程中，关键问题是主要国家是否具备必要的合作意愿和能力，以改革和加强现有秩序。美国、欧洲和日本依然有决心，但其能力受限于增长的缓慢、财政的紧缩以及政治的紊乱。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有增长实力，但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尚不强烈。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经济治理仍将显著变革。

本文原题为“The Evolving Institutional Landscape”。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为 CSIS 的亚洲经济高级顾问。该文 2014 年 11 月 8 日发表于 CSIS 官方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开发银行之间的斗争

Bessma Momani /文 刘洁/编译

导读：布里斯班 G20 峰会取得的重要进展是，有必要创建并维系能够承担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的开发性银行，这是达成 2% 的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条件。基础设施开发融资方面的竞争引发货币战争的同时也引发了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政治斗争。布里斯班峰会确立了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优于其他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的霸权地位，从而重申了 G20 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予以支持。编译如下：

2014 年 G20 布里斯班峰会取得了多项进展，不过最显眼的成果当属提出“创建并维系能够承担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的开发性银行”。布里斯班协定中关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一条是，G20 各领导人认同基础设施与投资的重要地位，这是全球实现 2% 的 GDP 增长目标以及为年轻人、妇女和残障人士创造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手段。

澳大利亚政府注意到，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与贷款规定之间存在着全球化的错配。它强调，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实施进程中的、但 2030 年之前预计不会完成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150 亿-200 亿美元，以满足其融资需求。G20 政府与国际组织均认为这一融资缺口应当加以弥补，许多领导人参与到布里斯班峰会中来，提出了不同的制度设计与组织构建想法，以期达成刺激基础设施投资的目标。

这种为刺激基础设施投资而提出的新理念、融资以及制度安排方面的竞争引发了银行间的斗争，这些银行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金砖银行、以及刚刚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20 最后公报对各国允诺的基础设施支出表示认可。

G20 公报同意澳大利亚政府和 B20 关于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的提议，该中心能够为那些寻求或是愿意提供基础设施融资的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信息与数据共享。该组织将设立一个小型秘书处，并将至少运营四年，由多边捐赠和商业提供运营资金。B20 估计这一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将为基础设施开发融资 2 万亿美元。该组织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但 G20 公报对其给予的明确肯定。并将中国提出的另一个组织比下去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政府直至 G20 布里斯班会议前夕还在寻求对其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 500 亿美元巨额资金的认可。与其他开发性银行不同的是，该银行有能力贷款给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会议前夕征求澳大利亚同意时，澳大利亚却选择退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构建成员序列，这也是迫于

美国方面不同意中国建立银行的压力。美国和日本均偏爱于长久建立起来的亚洲开发银行，来为基础设施开发融资，该银行由日本主导。

世界银行也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新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有所顾虑，因为这个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组织担心这两个新机构会贬低其自身创建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F）。世界银行似乎在担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不具备开发实施的最优标准。

G20 公报因此下调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的地位，由国际组织调为类似的非正式组织。在 G20 峰会期间，金砖四国成员——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也同意投入更多资金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不过 G20 公报重申了世界银行 GIF 的最终地位，并欢迎“其他开发银行的类似行为，并继续参与合作。”一种解读是，感谢所有资金都汇集到全球计算器中来，据说需要高达 2 万亿美元的资金来实现 G20 公报提出的 GDP 增长 2% 的最终目标，但也高度肯定世界银行 GIF 的霸权地位。

银行的斗争导致更多的资金承诺，但 G20 公报——一个需要 G20 成员国一致批准的文件——一直保持着其支持布雷顿森林组织即世界银行 GIF 的传统，而澳大利亚作为举办峰会的东道国也暂时性地获得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作为安慰。

本文原题为“The Battle of the Banks”，作者 Bessma Momani 为 CIGI 高级研究员，滑铁卢大学副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CIG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溢出效应持续发酵，新兴市场国家何去何从？

Jérémie Cohen-Setton/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发达国家在大衰退时期实施了不少财政或货币政策，然而其溢出效应却不断遭到新兴市场国家的抱怨。尽管美联储重新走入正轨，然而日本央行及欧央行依然在实施宽松政策。在其溢出效应下，新兴市场国家将何去何从？是否有办法限制过度的经济波动？编译如下：

1、溢出与协调

Olivier Blanchard, Luc Laeven 和 Esteban Vesperoni¹认为，有必要理解这种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这不仅关乎学术讨论，更重要的是政策的制定。

Anton Korinek 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会产生国际性的影响。在他的理论报告中，Korinek 发现：首先，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是适用的；其次，政策的这种溢出效应是有效率的，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 每个国家在国家市场中是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s）；
- 每个国家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
- 国家市场不存在任何缺陷。

如果上述任一条件不符合，溢出效应通常导致非效率；各个国家间的进行全球性合作，能够逐渐提升福利。

David Wessel 认为，如果一国央行采取的政策意在扩大需求，那么该政策是合法的；若旨在转移需求则反之。这个问题在理念上并不难回答，然而在实践中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取决于政府是否干预市场运行。如果财政机构采取过度紧缩的政策，那么它可能被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替代品，并使其货币贬值。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形容欧央行近期的行为：它既不能变更财政政策，也不能对量化宽松作出快速的反应，而只能依赖于华丽的词藻以期望欧元贬值。

2、非同步的退出策略带来溢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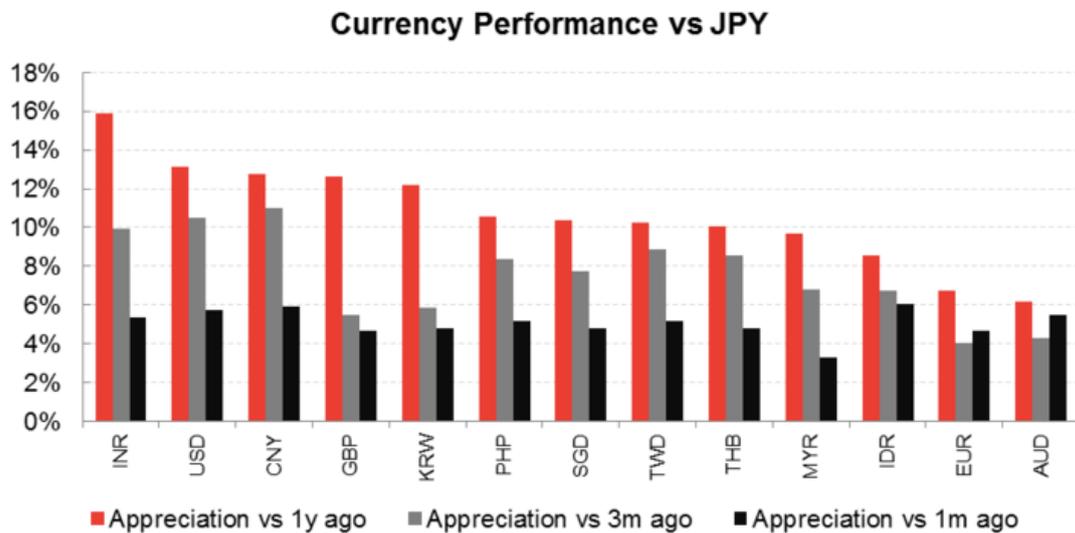
在关于“溢出效应”的报告中，IMF 写道，不同发达国家在不同阶段恢复常规政策会对利率、汇率波动造成更为广泛的影响。在过去，比较同步的紧缩周期会带来较高的世界利率和普遍的风险厌恶，以及在新兴市场国家股票证券市场中较高的压力。一个相对不同步的紧缩周期，正如当下的情况，会互相抵消其影响，从而降低利率上升的影响。此外，非同步的调整政策可能造成一些主要货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进而对一些国际收支不稳定、有外汇风险的国家造成困扰。

¹ 关于评论者的信息可点击文末链接查看。下同。

Barry Eichengreen 和 Poonam Gupta 认为，自 2013 年 5 月开始的“逐步退出量宽讨论”（tapering talk）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金融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基于跨国的经验研究，Eichengreen 和 Gupta 发现，并没有显著证据表明有着强大宏观经济基础（低赤字、低债务、大储备、高增长）的国家具备较强的“免疫力”，从而在汇率、外汇储备以及股价上下下降较少。

研究机构 Variant perception 写道，日本央行正在给其他亚洲国家央行施加压力。这些国家的较高贸易开放度及较强升值压力将严重拖累其增长预期。而作为应对，其他亚洲国家或将很快开始对汇率加大干预。

图 1 各国货币相对日元的表现



3、在资本管制上“宏观审慎”的态度

Julien Bengui 和 Javier Bianchi 认为，为应对近期的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采取了积极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增强对突发性资本撤离的“抗击”能力。这种在资本管制上“宏观审慎”的态度在学术及政策领域都有着坚实的基础，然而关于其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在持续。事实上，有文献表明资本管制措施具有外溢性，未必能对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稳定性提供帮助。此外，外溢性会在非监管领域转移风险，决策者进而会在监管领域加强管制以达到稳定。

Barry Eichengreen 和 Andrew Rose 认为，我们对于在资本管制频繁变动下的经济体会如何运作，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因此，我们以往并不会频繁变动资管管制政策。对于产出、贸易、金融稳定的短期波动，政府很少会变更其资本管制。

因为无论是执行抑或撤销资本管制，之后都将难以再变回原先的样子。与其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资本管制的强度会随着一些长期变量一同演进，这些变量包括国内金融深度、权衡下的民主程度、监管机构的好坏。

4、汇率对财政冲击有反应

Alan J. Auerbach and Yuriy Gorodnichenko 认为，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多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汇率对财政冲击有多大反应。利用美国政府军费支出的每日数据，他们发现未预期到的军费开支，将导致美元迅速而显著地升值。这一结论与国际经济学中许多不同形式的基本模型都保持一致，同时它表明财政冲击对其他国家会有较强的溢出效应。然而，这却与先前的研究成果形成鲜明对比。早先研究表明财政冲击会带来货币贬值，但这与经典的开放经济模型（的预测）并不一致。对此，我们认为，这一差异或许是源于早先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冲击的滞后性，以及是运用了实际支出而非公布值。

本文原题为“The spillovers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本文作者 Jérémie Cohen-Setton 为 Bruegel 加盟学者，在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零利率下限约束有多严重？

Eric T Swanson /文 杨国梁/编译

导读：2008年12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近零，并保持至今。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思维相反，直到2011年中期，货币政策并没有严重受此束缚。这意味着，美联储2009-2011年间的货币政策可以更宽松。本文的上述发现有助于解释2009年的财政刺激方案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编译如下：

2008年12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近零，并持续至今。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会持有实物货币，而不是将资金存于联储，以免回报显著为负；联储也不可能将联邦基金利率继续下调至零以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零下限”门槛。

按照传统宏观经济学思维，一旦货币政策遭遇零下限，联储将无法通过更多的行为刺激经济。此时，货币政策基本上是“停留在零”；财政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任何刺激，不会被货币政策抵消，从而比平时更为有效。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将不会“冲销”财政政策，因为只要经济疲软，利率就会继续保持为零。

1、货币预期的作用

近期的研究更多地强调货币政策预期的改变。Reifschneider、Williams (2000)、Eggertsson 和 Woodford (2003) 表示，联邦委员会如能可靠地承诺联邦基金利率未来的水平，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能解决“零下限”的约束。经济运行不仅取决于联邦基金利率当前的水平（为期一天），而且取决于对其未来数年的综合预期。换言之，企业和家庭通常会参考未来数年的利率预期来投资和融资。联储不仅可以将联邦基金利率当前水平设定为零，而且可以承诺未来特定时段保持在低位，以继续推低长期利率，从而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2、新的研究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我的合著者提出一个新方法，测量各期收益率的统计显著性和所面临约束的严峻性。几乎每一个工作日，都公布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如非农就业人数、GD 和 CPI 等。当这些数据不同于金融市场预期时，债券收益率都会呈现系统显著的反应。例如，如果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达不到预期，或者经济前景疲软、公开市场委员会不太可能很快提高利率，债券收益率往往就会大幅下降。反之亦然。

“宏观经济数据-债券收益率”的上述系统响应关系，可以用作基准来判断任何既定收益率是否正常。例如，一个既定的收益率如果像往常那样以相同的方式响应今天的消息（其取为1990-2000），则说明其是不受约束的，否则就是部分或者完全受约束的。

3、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启示

上述结果对货币和财政政策具有重要启示。现在回想起来，对于 2009-2011 年的货币政策，公开市场委员会原本可以做得更多，包括承诺联邦基金利率将在较长时段里保持低水平，从而进一步降低一年期和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2011 年 8 月初，当委员会发布 2013 年年中前瞻性指导时，那些较长期的利率下降到零下限位置。未来，委员会可以明确采用类似做法来影响较长期利率，从而调节经济。

对于财政政策，2009-2011 年间的挤出效应并没有显著不同于常态。联邦基金利率设定在零下限，但是一年期尤其是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此期间基本上均不受约束。结果，2009 年通过的 ARRA 财政刺激方案象往常那样提高了利率预期，其挤出效应也同常态一样大小。这有助于部分解释，早期的财政刺激方案尽管规模非常大，但经济复苏效果依然令人失望。

本文原题为“[How severe has the zero lower bound constraint been?](#)”。作者 Eric T Swanson 为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经济学教授。该文 2014 年 11 月 8 日发表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贸易自由化带来双赢

Cathleen Cimino /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近期，国际贸易市场展现出较好的态势。信息技术协议（ITA）、贸易促进协议（TFA）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都在稳步推进。如果这三个协议顺利达成，将会极大地刺激全球 GDP 的增长。本文对前两个协议签订过程进行分析和展望。编译如下：

国际贸易市场最近传来了好消息：在信息技术协议（ITA）中，中美已经同意放宽关税；在贸易促进协议（TFA），美国和印度也找到了打破当前僵局的方法。再加上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稳步推进，尽管 WTO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是 WTO 在此之后已经做出了可观的贡献。如果三个协议都成功签署，全球总收入预计会增加 2 万亿美元。

1、ITA 关税放宽

停滞两年后，ITA 在 2014 年 11 月 10 日发生了重要的突破。ITA 在 1996 年由 29 国签署第一份协议之后，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额增长至原来的三倍，达到 4 万亿美元。目前这个协议覆盖了 80 多个国家和全球 97% 的 IT 产品贸易。信息时代要求更多的产品与国家参与 ITA。但是中国拒绝放宽关税使得谈判僵持不下。中美之间的协定包括了 200 多种产品，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美国科技产品例如高级半导体、核磁共振仪等。

在未来 5 年之内，关税会慢慢放宽（个别情况则是 7 年）。美国贸易代表（USTR）预计这会减少涉及 1 万亿美元贸易的关税并刺激全球 GDP 增长 1 千 9 亿美元，让美国增加 6 万就业岗位。中国最初列举了 140 种产品作为敏感贸易产品。现在中国排除了其中的 70 种，并且计划在未来排除剩余的 70 种。鉴于中国之前在国际贸易协商中的表现，中国在 2014 年 11 月 APEC 展现了很强的灵活性。

虽然协议最终要到日内瓦签订，但是中国态度的转变使得进程大大加快，最早于 2014 年 12 月就能够完成。中美此次握手有可能会让其他领域的进展更加顺利，例如 TISA。最初美国对于中国参与 TISA 持反对态度，部分是因为中国原来的态度一直强硬，不愿妥协。

2、推进 TFA

2014 年 11 月 12 日，在 ITA 取得成果的两天之后，美国与印度就 TFA 达成了双边妥协。这会减少贸易中出现的腐败、官僚主义和交易成本，物流速度也会大大加快。2013 年 12 月，WTO 在巴厘岛召开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会议上成员国已经同意签署 TFA。还有另外 9 个有关农贸商品的协定也一并通过。因为多哈会议进展缓慢，贸易政策专家一致同意 TFA 是那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但是在 2014 年 7 月，印度反悔了，坚持认为在 TFA 圆满完成并成为 WTO 中的绑定协议之前，必须达成一个食品安全协定。印度方要求贫穷国家应该可以进口任何高价食物，分发这些食物，然后重新出口剩余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不受到任何成员国的挑战。对于印度的要求，美国与欧盟进一步明确了巴厘决定的一些细节，但是拒绝进一步修改协定。印度不接受这个事实，使得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不得不搁置关于 TFA 的进一步谈判。

随着印度和美国解决上面的问题，巴厘协定的原意也将被重新改写。新的解释称，直到达成永久性协议，食物补贴计划都不会服从 WTO 中的谈判。这也使重新开展巴厘协定的其他议题成为可能。

3、为多边协定提供可能

以上两个协议的进步让 WTO 看见了转机。但随之而来有两个问题。重新开展多边协定，增加新的议题是可能的吗？以及，其他国家有可能效仿印度原先的敌意态度吗？

TFA 和 ITA 的成功会为解决其他问题打开大门，例如服务、投资和环境商品。很早之前，我们就认为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是多边协定。协定针对签署国而非所有的成员国。原则上，其他的成员国家之后也可以加入。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未来的协定是基于条件还是无条件最惠国条例？目前，与 TISA 设计相似的条件性最惠国条例是最有可能的。

解决多哈会谈的分歧带来了很大挑战，这都将给 WTO 的乐观前景蒙上阴影。进一步，也将给 TFA 的戏剧性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当某一个国家使用否决权的时候，这仍然是个大问题。如果未来有人说不，他们会阻碍所有 WTO 的协定。

本文原题为“Double Win for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Bali”。本文作者 Cathleen Cimino 为 CSIS 下“繁荣与发展”计划主任，Conor Savoy 为美国发展领导计划副主任。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解读一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

Amy Jean Studdart 和 David A. Parker/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今年，中国中央领导集体试图通过全面经济改革实现经济发展再平衡，这一宏伟计划涉及范围甚广，力度甚大，成为国内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作者认为，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改革计划不同，本次改革是一次“潜在的革命”，它注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全新的协调机制的“顶层设计”，宏观政策实验更趋审慎，更多地考虑应对国际压力。同时，此次改革也蕴藏着潜在风险：第一，有限的试点无法预期整体政策效果，反而加剧改革政治学的复杂性；第二，渐进性改革方式已不适合当前极为复杂的经济形势。编译如下：

一年以前，中国领导人正式提出了实施全面经济改革的方案，力求实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再平衡。据估计，如果这一方案得以贯彻落实，将在未来十年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然而，如果改革失败，那么到 2020 年，中国的年度 GDP 增长率将下降到 1% 以下。前期发布的西蒙项目研究报告（Simon Chair report）曾指出，中国实施全面经济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从全面经济改革的开局之年可以看出，中国领导集体试图通过积极重组臃肿的经济决策机构来满足新的经济增长需求。结果可谓乐观，但是并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中国要在 2020 年之前实现全面经济改革“有意义的进展”仍任重而道远，并且当前战略所隐藏的潜在风险正日益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并没有摆脱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存在的“可信度”问题。在上二代领导集体执政的 10 年期间，经济改革进程已陷入停滞，并且长期以来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也已充分暴露。全面经济改革曾被描述为经济“威震与恐吓”，但是三中全会击碎了这一说法。经济分析家们赞叹此次改革涉及范围的广度、习总书记的决策开启了其个人品牌的议程、新的高层政策协调机构（习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的设立以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承诺，并将其称赞为一次“潜在的革命”。随着对改革议程最初兴奋的逐渐消退，习总书记政权得以巩固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比邓小平以来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行事果断。

尽管如此，习总书记对政治权利手段的指示应该为经济改革明确一个优先次序。从此意义上来说，三中全会议题的广泛性也存在不足。为有效协调中国庞大的经济决策机构，确保重点改革领域，如金融改革能够优先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有必要确定改革的优先顺序。

在中国中央政府文件中，这是设立负责监督全面经济改革进程的“领导小组”背后的动机因素之一。习近平亲自监督经济改革进程的努力以及对改革小组政策专家建议的依赖，可能已经阻断了业已建立起来的官僚政治之间的沟通渠

道，并且至少在目前阶段，恶化了官僚政治之间的协调机制。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当官僚政治沟通协调之后所导致的经济成本不断上升时，将会减缓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

三中全会议程如此广泛，也已经影响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地方领导人制定政策目标来进行管理，主要靠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政策目标。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推行改革“顶层设计”的承诺却意味着，他们将通过强制地方政府保持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来最终实现政策实施的高度统一。同时，中央政府已经再次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以及采取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中央政府统一组织框架下，预计 800 个地方改革小组将会成立，这可以被理解为，不仅要建立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而且要建立中央指令在地方领导人和中央决策者之间传递的新的传送带。这将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从而实现既符合国家利益又符合地方利益的改革效果。然而，这同时也是一个极易受到破坏的微妙的平衡关系：可能会导致过于死板和碎片化的改革方式，继而抑制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提高是市场改革的目标所在。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领导集体的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在采用政策实验方面表现得更加审慎。长期以来，中国通过设立“试点”来进行改革实验，从而支持成功政策的推广，限制失败政策的影响范围。迄今为止，习近平领导集团所实施的试用政策中，上海自贸区作为一种制度改革方式更加显著。起初，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只是作为金融改革的实验基地，但是一年以后相继引入了大量的其他经济改革。反而，上海自贸区成为了主要服务于政府行政改革的实验基地，例如放松新企业登记的要求、试用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负面清单”等。

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改革方式是有保证的。尤其是在金融改革领域，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有关快速自由化创造危机爆发的条件的例子。然而，从宏观审慎来说，当潜在风险已经产生时，制度改革也是冒险的。另一个潜在的难题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释放出来政策成功信号的制度改革实验可能会被误判为政策失败，这已经演变成为经济改革的政治障碍。

迄今为止，上海自贸区发展的路线也体现了中央政府经济决策的另一面：中国应对国际压力的方式。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鼓励中国加速金融自由化改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无视这一压力，只有美国的建议与中国要确保本国经济稳定的目标相协调时才会加以考虑。习近平领导集体照样遵照这一模式的同时，国际压力已经对上海自贸区的实验产生了影响。根据中国高层经济顾问的观点，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匹配

TPP 谈判的进展。日本于 2013 年 4 月决定加入这一谈判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在接下来的数月使中国与美国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并且在上海自贸区内试用需要签订最终协议的诸多经济改革。

回顾习近平领导集体实施经济改革的新兴战略，存在两种风险：第一，有限范围内的改革实验和政策实施的碎片化方式无法体现预期的整体政策效果，还会使已经存在的难以处理的改革政治学变得更加复杂。第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已不合时宜。中国领导人握有能够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工具，从经验技术丰富的专家到高额的外汇储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也的确在经济危机管理方面表现突出。然而，过去的做法不一定是未来成功的良好向导。历史上最近的主要改革推动结束于十年前，当时中国经济规模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并且仍然存在选择出口导向型和过度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余地。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情况已经极为复杂，改革以及危机管理所面临的挑战也会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本文原题为“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Reading China's Reforms One Year On”。本文作者 Amy Jean Studdart 为 CSIS 西蒙政治经济研究项目副主任，David A. Parker 为 CSIS 西蒙政治经济研究项目研究助手。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而非衰退

Kent Troutman/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房地产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性在中国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近期的种种数据引发人们对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衰退的担忧。本文认为短期来看，房地产行业确实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需求依旧旺盛，同时中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基于中长期结构性因素，本文认为此番房地产业下行主要是对之前产能过剩的调整，而非衰退。编译如下：

1、近期房地产数据不容乐观，但仍有较大调控空间

2013 年房地产投资占中国 GDP 的 16%，这一投资总量几乎相当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经济总量之和，由此可见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但近期种种数据都引发各界对于中国房地产业可能崩盘的担忧。首先是房屋销售量在今年下滑 10%，投资增速减半，同时三季度 GDP 增速下滑至 7.3%。另外，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90% 的城市家庭已经拥有住房，因此长远来看城市住房市场似乎已接近饱和。多方面的数据引发市场对于房地产行业未来走势的担心，甚至有人预测中国正陷入日本式的房地产危机。

但尽管如此，年底整体房价能否基本稳定尚不确定。更重要的是，中央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上还留有很大调整余地，例如现行的贷款比上限（30%）、贷款利率下限等。对于北上广等大型城市，目前相应的限制措施则更多，这都意味着未来中央可调控空间很大。考虑到目前中国首套房在全部房屋购买交易中占比仅为 1/5，所以近期对于二套房限购政策的放松就是一个明确而有力的信号。

2、中长期支撑房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从中长期来看，诸多基本面因素可支撑房地产业向好发展。从房屋自有率上看，这一数字在城市居民中已经很高，这也是很多研究得出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已近饱和的主要依据。但这一论断仅仅考虑了城市中拥有城市户口居民，而忽视了大量农民工及其他在城市工作、生活的非正式居民，这部分人口体量庞大，却无法购置房产。

除此之外，尽管中国的城镇化率近几十年来上升迅速，但就绝对值来说，仍处于较低水平。据官方估计，到 2023 年将有超过 2 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届时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将释放出大量住房需求。

3、房地产业风险不容忽视，但整体可控

近期来看，房地产相关行业及金融机构风险的确有所上升，尤其是对于那些高杠杆率的开发商，可能出现由于材料价格下跌导致的融资紧张。但整体来看风险仍旧处于可控范围。

此外，地产商大多放慢了拿地速度，转而进入去库存阶段。未来房地产业将进入整合期，许多流动性低的小企业将被资金状况更为健康的大企业兼并。

从金融健康状况来看，相比其他一些曾陷入房地产危机国家，我国家庭层面金融资产状况更为合理。一方面只有 30% 的家庭负有债务，购房过程中使用贷款家庭比例也仅为 20%，同时即使是在那些贷款家户中，贷款占房屋价值的比例平均也不过 5%。另一方面，下一步中国将大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存款利率，同时鼓励居民增加对外国证券投资——在此过程中房地产投资依旧将是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

4、结论

在经历了数年的房地产过度投资后，近期由于产能过剩累积的风险正在显现，但就中长期来看，结构性因素依旧足以支撑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

中国领导人目前正致力于改变以往投资导向的增长模式，所以未来房地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重要性可能有所下降。但无论如何，中国房地产业的崩盘将是大家都不愿见到的结果。

本文原题为“China's Property Market Set for Correction, Not Collapse”。本文作者 Kent Troutman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以福尔布莱特学者身份在中国进行研究。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官网，并于 10 月发表于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杂志。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 国集团与全球治理：可以做的更好吗？

Stephen Grenville/文 马文龙/编译

导读：20 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本周末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些人开始质疑 G20 是否还有实用性。这个排他性的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组成的集团能否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希望？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编译如下：

1、评论

当今世界需要我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但是，主权国家不愿把国家权力让渡给一个超国家行为体。这样，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这个问题上存在广泛分歧。

当 2008 年 G20 领导人召开第一次会议时，这一新机制取代越来越不具代表性的七国集团(G7)成为经济领域协调全球治理的关键性机制。从早期来看，其发展前景是很广阔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它在协调全球性财政刺激和督促各主要国家抵制曾导致 1930 年代大萧条期间全球贸易持续下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但是，随着危机的消退，20 国集团的效用也在持续减弱。

2、全球治理的失败

今天，有关全球治理方面失败的例子有很多，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和配额的调整都没有很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上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这一客观现实。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持续十年之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世界卫生组织（WHO）仍然缺乏有效履行其职责的权力与资源，与此同时，埃博拉病毒的爆发也向我们敲响警钟，在处理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科学界已对气候问题达成高度共识，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似乎没有达成任何全球性协议的迹象，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留给我们采取长远行动的时间已不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也即将于 2015 到期。此外，其他一些全球性问题还包括：有效的国际税收协调；主权债务的重组；持续增加的难民潮。

当然，G20 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它从一开始就主要关注宏观经济问题，而且从 2008 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依然缓慢，这一问题领域仍充满挑战。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在抱怨发达经济体正在挑起非传统的货币政策领域的“货币战争”。

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领域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更专门的、更独特的方法都有所尝试，并逐步超越双边走向多边范畴，这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东盟为基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发起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共同存在说明在区域贸易问题上存在相互重叠的措施。

开发银行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像世界银行一样，各地也有一些区域性的发展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ADB），金砖四国的新发展银行，以及中国最近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金融安全网络方面，也已经有欧洲的欧洲稳定机制和东亚的清迈倡议多边化措施。

3、20 国集团可以做得更好

20 国集团所具有的这些缺点，同时也为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会。我们必须承认它本身所具有的缺陷。然而继续争论它的成员构成只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20 国集团成员国最初也是基于特殊情况才聚集在一起的）。讨论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妥协（这是联合国和其他全球性的机构所共同具有的缺点）和其成员有效性也不会有任何结果。G20 的成员规模已经很合适，与其争论其成员国的调整不如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它与其他组织的联系与扩展上。

关键的事实是，G20 是汇集了世界上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国际峰会，七国集团（G7）已不能反映全球权力的真实情况。其他领导人参与的会议也会讨论次全球性的议题。当然，G20 的议程有时显得太窄（如上述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有些时候又显得太广（这些议程或者同其它组织的议程重合或者涉及到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同时，当领导人会面时，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自己认为重要的国际问题。这意味着，G20 会议上经常会有分歧和争论，一如在乌克兰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那样。

4、需要进一步强调 G20 机制的作用

尽管这可能会对现有的激烈竞争的全球机制形成挑战，但是这将使结构更加有效。同时，这一机制的缺点是，可能把 G20 当做全球唯一的主导型机制。领导人可能将他们的角色视为一个提供建议和指导的指导委员会，将自己的优先考虑事项准确地传达给其他相关的国际行为体。

这些组织将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治理结构，但他们也知道只要 20 国集团(G20)传达出达成高度一致的强烈信息，这个信息背后的投票权重可能最终决定他们的态度。

这并不要求对全球治理进行彻底的改革。从最开始提到的几个问题开始足以（比如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缺乏代表性的问题）。一个来自 G20

近乎一致的呼吁可能促使目前国内的阻碍因素发生一些积极改变。税收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显明的例子，明确支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现有工作的信号，应该足以推动国际社会在前沿问题上取得进展。

气候问题似乎已经适应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其中具体的问题都交由专门的机制来处理（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是反对者担心 G20 所具有的潜在力量。

20 国集团是一个的庞大而难以有效控制的机制，它没有一个常设的秘书处或永久性的会议主席。但是，它仍然是我们处理全球治理问题最有效的机制。

本文原题为“G20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n it Do Better? ”。本文作者史蒂芬·格伦维尔（Stephen Grenville）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教授。本文于2014年11月14日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埃博拉的爆发对公共卫生与安全的启示

Peter Clevestig/文 李骁/编译

导读：2014年9月30日，西非以外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在德克萨斯的达拉斯被确诊。当该病的其他几个疑似病例——包括在瑞典的一例——被证实并非埃博拉，德克萨斯的病例可能成为合理动员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一个起点。然而，它也有可能证明，任何类似的动员都来得有点太迟了。决策者的关键任务，将是在国际安全议程中为全球卫生事业更大范围的议题提供一个永久的地位。本文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彼得·克莱乌斯蒂格撰写。编译如下：

1、埃博拉爆发的概况

自（埃博拉）病毒于1976年被首次发现以来，埃博拉疫情起初只是零散和孤立的。导致其最近爆发的是该病毒大规模的扩散，并且牵涉了多个国家。被传染之后的临床表现很可怕，而高死亡率（大约50%）和缺少便利的治疗条件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一个十分显见的威胁。

最近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可能最初发生于2013年，但（当时）并未被卫生部门通报或确证。2014年3月22日，几内亚官方确诊了第一例病例，从此该病毒迅速侵袭了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传染了6500多人，目前他们中的3091人已经死亡。

目前，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的应对埃博拉的模式工具的预估，如果没有更多遏制措施，到2015年1月该病毒将会在西非传染140万人。据一份报告指出，为了有效阻止（埃博拉）肆虐，70%以上的病人必须进入埃博拉治疗部门，或者被安置在疾病传播风险较低并且能安全处理遗体的环境之中。

2、国际反应

2014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在美国同28个国家（的代表）一起启动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HSA），该议程旨在加强为应对包括自然的、突发的或人为的传染性疾病的威胁的国际合作。

2014年9月17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介绍了一种应对埃博拉肆虐的新措施，并指出埃博拉是对全球人类健康与国家安全的共同威胁。该措施包括了一项承诺，即向西非派遣3000人的医疗救助队伍。

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次讨论西非形势变动的紧急会议，协调国际应对措施，并开始分摊集体资源，以在该地区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安理会宣布埃博拉是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宣布成立联合国埃博拉疫情紧急响应特派团（UNMEER），该特派团有五项主要任务：阻止

（目前疫情的）爆发、治疗被感染者、确保必要的服务、维持稳定和防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3、埃博拉对国际安全的未来影响

国际社会主动采取的措施将有望把全球卫生（领域）更大氛围的议题纳入国际安全议程。然而，尽管（埃博拉的）爆发毫无疑问地强调了像全球卫生安全议程这样的事务的重要性，但目前仍存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国际协调能否在埃博拉的肆虐被平息之后得以继续运作。

埃博拉近来正在影响非洲的一些最为贫穷、最为脆弱的国家，而那里的医疗系统却是过度分散和不合格的。紧随最近的（疫情）肆虐而来的，可能是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这些国家现有的医疗系统中的人员和药物完全不够，这将转而导致地区的不稳定。

时间将会解答当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准备就绪的计划是否足以抵挡该病毒的进一步肆虐。但规划的缺乏、糟糕的通讯和其他薄弱环节仍然存在。例如，在美国目前存在的一个困难是，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程序来处置和清理来自埃博拉患者的临床废弃物。

9月2日，联合国副秘书长简·埃利亚松说，目前埃博拉的扩散是“对多边主义的一项测试；也是对国际社会帮助那些正处于极端苦难中的人们的团结程度的一项测试”。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提醒如下的事实来保持国际社会的（团结）动力：全球卫生与公共安全是相互依赖的。

本文原题为“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bola outbreak for public health and security”。本文作者彼得·克莱乌斯蒂格（Peter Clevestig）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化学与生物安全计划的资深分析员。本文于2014年10月2日刊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Yang Razali Kassim/文 郭楚/编译

导读: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其在东亚、亚太的影响力不断持续提高。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战略存在也将长期维持。未来推进亚太经贸合作的不同路径仍具有竞争性和不确定性。在一个崛起的中国和一个守成的美国的夹缝中,东盟将何去何从?编译如下:

过去一周在北京忙碌紧张的高层外交见证了中国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同时也将见证中国将区域经济领导权从传统领导者——美国的手中夺取过来。

刚刚结束的 APEC 领导人峰会无疑是北京的一次实力秀。北京做到了展示符合其身份的形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领导着这个地区迈向亚太自贸区(FTAAP)。对于这个曾经都不是世界贸易体系一部分的封闭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通过举办 APEC 峰会,中国使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黯然失色,并在峰会中使其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通过峰会,习近平主席已充分澄清中国的立场,即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不能不顾及到中国的地位和存在;而且事实上这一进程从今以后将由中国来主导。北京的 APEC 共同宣言体现着朝向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路线图,尽管具体明确的期限没有被提出。世界主要力量的经济权力比拼游戏的第二轮接着在缅甸展开,东盟将在此主持召开中国和美国都是其成员的东亚峰会(中国的参会者是李克强总理)。

有意思的是,北京将 APEC 作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平台。APEC 自 1989 年出现以来,其事实上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工具。确实,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亚太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中国提出的设想,而是一个在 2004 年就被提出来的 APEC 愿景,即建成亚太自贸区是亚太地区最大范围自由贸易区的最终目标。

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大国引领和具备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如 1993 年在西雅图主持召开首届 APEC 峰会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随着时间的推移,APEC 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功能逐渐减弱。

在 APEC 处于低潮期的这些年,东盟(ASEAN)退而寻求自己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推进东盟自贸区(AFTA),并倡议将自贸区拓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之后出现了两个平台:一个是 TPP,由美国领导而没有中国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个是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那就是“10+3”的扩大版,包括了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由于中国可能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对 RCEP 的主导权，并坚持其是一个东亚合作平台，意思就是在这里没有美国参加的必要。因此这也是美国迫切希望将 TPP 打造成通向亚太自贸区主要路径的部分动因。

尽管 TPP 与 RCEP 已演化成为一组竞争的机制，但近来中国和美国都淡化了他们的竞争性。在东盟内部也是这样，虽然一部分国家支持 TPP，另一些倾向选择 RCEP。一方面，十个东盟国家中只有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这四个目前参加了 TPP 谈判。另一方面，RCEP 包含了所有东盟成员，参加 RCEP 都会使自己由于与中国加强贸易联系而获得潜在的收益。

尽管东盟整体上珍视中国这个关系密切的经济伙伴，但是同时也对其持续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有一定警惕。这导致了东盟与中国关系的一种双重关系性——一些人称之为二元性，那就是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同时，也混杂着由于中国在南海问题强硬的立场所带来的政治紧张关系。

这周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就是在如何处理这种二元性关系的背景中召开的。通过加快推进实现亚太自贸区，中国事实上也促使东盟经济政治一体化加快了步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包括在 2015 年 12 月 31 号以前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不能再继续推迟。届时 80% 的一体化目标将会达成，剩下的“硬核问题”将在 2015 年后继续处理。

但可以肯定的是，下一步的问题将不仅仅只是处理这些未尽事宜。如果 2015 年的东盟共同体将又是一个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设想路径的话，那么 2015 年后东盟的前景又将如何？这是每一个东盟领导人都应当考虑到的，应共同努力促使一个新的东盟朝向更加符合 21 世纪发展潮流的方向发展。

这个新的愿景必须结合亚太地区快速演变的经济和安全构架来设想。正如这周的北京 APEC 峰会所展示的，在亚太合作的未来宏图中，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领导力将走向前台，同样地，在政治影响力上发挥领导作用。

当东盟领导人正准备汇聚在内比都参加东亚峰会时，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尝试着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重新规划，探索新的相处之道。在这样的氛围下，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奥巴马只是一个即将届满卸任的跛脚鸭，而习近平却才开始执政两年，他有 10 年的时间来领导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

东盟的两难是：它重视与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越来越良好的关系，但也意识到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准备好展示力量——比如在南海问题上，这也将会导致双方潜在的政治紧张。有趣的是，在这次繁忙的峰会期间领土争端带来的地区紧张却一定程度地得到了缓解。

在中美这两个巨人在权力政治游戏博弈的过程中，东盟仍将继续保持一个旁观者身份躲在一边观望么？或者说东盟将有所作为，发挥关键的作用，以便在未来的地区均势中取得对己有利的平衡？在内比都的东亚峰会上，这个核心问题必须是东盟领导人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

本文原题名为“Asia Pacific Economic Leadership: Shifting from the US to China?”。本文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Yang Razali Kassim。本文刊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Jim Balsillie成立于2001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